

新年感言

《西安史志撷英》编辑部

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中,2008年已经步履匆匆地离我们而去,我们又走进了新的一年。

我们欣喜地看到,《西安史志撷英》自改版以来,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广泛好评。众所周知,《西安史志撷英》的前身是创办于2002年9月的《西安史志通讯》,2008年元月改版后,为了满足市内广大党政干部的阅读需求,我们扩大了送阅量,由原来的每期一百多份增加到每期三百多份。随着影响的扩大,外来原创稿件与日俱增,编务工作量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一倍多。作为编者,读者的好评,既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编辑部同仁每收到一封表扬的信件,每接到一个称赞的电话,甚至每看见一种默许的眼神,都会喜不自禁,挂在眉梢。扪心自问,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读者的好评,更多的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是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对我们工作的首肯,和同行业、同类型的优秀读物相比,我们的工作仍有一定的差距。

盘点一年来的编务工作,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可喜可贺、可圈可点的,尽管也有错误、有疏漏、有遗憾,甚至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编辑部同仁都做到了尽心竭力。在编稿任务重,编辑人员少的情况下,大家齐心协力,不辞辛苦,始终把读者是否喜欢,是否满意,作为编好《西安史志撷英》的第一准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也许,在文化底蕴深厚的西安,《西安史志撷英》只是文化百花园中不起眼的一朵小花,但我们坚信,只要它朴实地成长,静静地绽放,就一定会吐露芬芳,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驻足观赏!



人文西安赋

□ 姚敏杰

三秦首府，西北重镇。炎黄肇始，人文化成。“蓝田猿人”开启山林用石火，半坡先民筭路蓝缕创文明。“丝绸之路”由此发端，华夏文明于斯传播。人皆谓孔子圣孟子贤，礼仪多出自东鲁；岂不知文王谟武王烈，道统早创于西秦。西周建两京，制作礼乐安社稷；秦王扫六合，统一度量定邦国。汉唐盛世，歌舞升平。长治久安，万国摩肩而来朝；彝伦攸叙，四夷俯首而称臣。威加海内，德示天下。物华天宝，雄居八百里秦川；人杰地灵，历经十三朝皇都。

江山既留胜迹，我辈宜复登临。遍游西安，庶几可得中华文明史之多半矣。阅兵马俑阵容，耳畔犹闻厮杀声；赏华清池春色，脑际萦回《长恨歌》。骊山晚照，旷士登高而遐思；灞柳风烟，骚人攀折而伤别。终南月冷，草木有声；蓝田日暖，美玉生烟。太白积雪，六月犹寒；曲江流饮，四季如春。雁塔巍峨，极目玄奘取经西去；楼观形胜，迎迓老聃传道东来。览艺术之瑰宝，非碑林而莫属；探

佛教之奥秘，舍法门其谁欤？汉家陵阙，唐皇墓冢，若非世事人间巧安排，会向地气风水独钟毓！

近代以降，西安成为进步革命之集散地。志士仁人坚驻堡垒守城池，青年学子经由斯地赴延安。“西安事变”，谱写救亡华彩乐章；张杨兵谏，吟就抗日壮丽诗篇。曾几何时，西安亦曾屡遭兵燹，内忧外患；腹背受敌，伤痕累累。垣残壁断，古城历尽劫波；黍离麦秀，黎民翘首和平。物换星移，几度春秋。西安人民，喜迎解放。

西安古今，代不乏人；人文精神，薪火传承。历史考古，名闻遐迩；文学艺术，誉满神州。《诗经》三百篇，字字珠玑；《史记》数文言，篇篇佳构。汉赋流传百世，唐诗光照千秋。观汉唐之乐舞，心随之而翩翩；听梨园之秦腔，情因之而锵锵！挥毫泼墨，画家高手云集。赏“长安画派”，令人铁骨铮铮；倾情笔耕，作家人才辈出。看“陕军东征”，使人热血沸腾。影视、小品，屡拔头彩获好评；戏

曲、音乐,数折桂冠赢佳绩。

文教赖历史传承,经济蓄后发优势。会展洽谈,招商引资,经济再上台阶;交流研讨,推陈出新,文化重现繁荣。经济与文化竞艳,高教共科技争辉。冀府业隆,古城建设后继有人;科苑创新,西安腾飞指日可待!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城创卫,天蓝水绿。地铁在建,路桥日增。旧城改造,日新月异;新区建设,地覆天翻。广植梧桐,凤凰来仪。“欧亚论坛”,列国政要争先恐后;“人文奥运”,各路明星纷至沓来。曲江池中,游人摇桨戏水;广运潭上,健儿引擎竞舟。社区、公园,同唱人文新歌;城里、乡下,共奏和谐旋律。儒正典则,方见古城厚德;恢宏大气,凸显西安活力!

俱往矣,看更美西安,俟诸来日!

乔清心

乔清心(1909~?),俗名金镜。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1931年为华山派第31代道士,1933年起外出云游,曾到西安八仙宫挂单。1943年在黑龙江双城县无量观受“三坛大戒”。1948年春回到华山,同年10月再度到西安八仙宫挂单,后到长安县长春堂任知客。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乔回八仙宫主持道观事务,任监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乔为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3年曾代表陕西道教界人士赴朝鲜慰问。1954年乔当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1957年中国道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乔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乔能书善画,其书法作品笔力苍劲,画作生动传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1966年8月下旬某日,乔见八仙宫道教塑像被推倒在地,任人践踏,道教经典也被堆在院中焚烧,泪流满面,狂笑而去,不知所往。

神童李泌

□ 彭栋为



李泌，唐京兆(今西安)人，字长源。泌大器早成，七岁便能诗善文，颖悟过人，时人称之为“神童”。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李隆基自另一九岁神童员俶口中闻知他的才名，立即差人以快马召其入宫会面。李泌到时，玄宗正与宰相张说对弈，命张当场试其诗才。张说即棋命题，让李泌以“方圆动静”赋诗。李泌说：“愿闻其略。”张说对着围棋随口吟诗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不假思索，应声而对：“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骋才，静如遂意。”言毕，在坐诸人瞠目结舌，大为惊异。张说以得“奇童”向皇帝祝贺，玄宗也龙颜

大悦，立“赐束帛”，并传旨其家：“善视养之。”由是李泌奇童之名更播于京师，传于士林，乃至妇孺咸知。

李泌这首短诗的不同凡响，在于它立意高邈，能由下棋这一生活中寻常之事，驰神联想到治世为人，悟出安国处事之道，借物抒怀，展示出作者自幼不凡的胸襟和抱负。以一七岁童子而言，能有如此敏捷的才思及过人之志向，李泌之才实在超群绝伦，堪称古今无双之神童。

李泌一生出入中禁，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及德宗四朝，位至宰相，封邺侯。在安邦治国中施展了他卓越智慧和才能。

“解空第一人”——长安僧肇

在我国佛教史上，祖籍长安的高僧大德辈出，贡献多多。东晋十六国时代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僧肇，就是杰出代表。

僧肇(384年~414年)，俗姓张氏，京兆(今西安市)人。自幼家贫，以代人抄书度日，从而使得他有机会博览经史典籍。时值老庄玄学风行，僧肇“爱好玄微”，曾读《道德经》，“以《庄》《老》为心要”，崇信老庄。及读旧译的佛教典籍——《维摩经》，倍加欣赏。遂皈依佛门，学大乘经籍，通晓经典、戒律、论述或注解三类佛家经典。僧肇二十岁时已崭露头角，以才思敏捷、辩锋犀利而享誉长安佛界。有的人还不远千里负粮前来和僧肇舌战，但都一一败下阵来，从而使他成为闻名关内外的青年

佛学理论家。

不久，天赐良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僧肇闻讯，日夜兼程奔赴姑臧，拜罗什为师，不遗余力，深受赏识。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姚兴将罗什迎入长安，僧肇也从师返回故里，继续佛教理论活动。

僧肇才华横溢，在罗什门徒中最年轻，影响最大，声望最高。师事罗什后的主要弘法活动有二：一是协助译经。罗什抵长安后，姚兴“待以国师之礼”，敬之如神。鼎力支持他说法译经，并命僧肇等入逍遥园，协助大师译经，评定经论。他们从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到弘始十五年(413年)四月，前后十一年多，先后译出佛经35部294卷(一说74部384卷。)，后秦几乎成了佛教王国，长安成

为全国佛教中心。二是著述。僧肇自幼熟读经史典籍，出家后潜心研究大乘经籍，尤其对罗什的佛学理论领会极深。他的佛学理论快速地飞升，进入巅峰。404年他用生动的文字写出《般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呈罗什过目，罗什读后激动不已，首肯理论精当，文辞优美。庐山隐士刘遗民看到僧肇论文后大为赞赏道：“不意方袍(僧人)，复有平叔(何晏)。”把僧肇视为魏晋玄学开创者之一的何晏。入庐山在东林寺传法的高僧慧远看了这一佳作，拍案而起，赞颂道“未尝有也”。此后，僧肇又撰写了我国佛学史上的名篇《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等佛学论文。僧肇的佛学著作还有《百序轮》、《维摩诘经序》、《注维摩诘经》、《答刘

遗民书》、《长阿含经序》、《分四律序》、《梵网经序》、《鸠摩罗什法师诂并序》等。这些惊人的业绩，是他勤奋译经、著述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这位虔诚的佛门才俊仅活了31岁(一说41岁)，英年早逝，过早地结束了佛理研究，但他的佛学论文哲理性强，语言文字精练，是我国佛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叹服，他把我国佛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高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甚至形成专门的学问，所以被后人誉为我国“解空第一人”。



韩建改筑长安城

唐朝末年，朱温逼唐昭帝迁都洛阳，长安遭受一场空前浩劫。天祐元年（904年）三月，朱温奏请以长安为佑国军，徙洛阳佑国军驻长安，以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

韩建（854~912年），字佐时，许州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因积极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得到朱温的赏识。他为佑国军节度使，为了驻军和防守的方便，重新修筑了一座规模和范围大大缩小了的长安城。“去宫城，又去外廓城，重修子城。”所谓“子城”即原来的皇城，东西长5里115步，南北宽3里140步，周围17里150步。是为“新城”。新城因为规模小，人口少，所以原来的城门显得太多，四面仅各开一门：北为玄武门，南为安上门，西为顺义门，东为景风门。长安城缩小以后，原来的长安、咸宁县治就被隔在城外，因此，又在城的東西修建了两个小城，作为二县的县城。把二县县治摆在城外，一方面反映新城的范围十分狭小，另一方面也是有意如此

安排，使三城并列，互相支援，更能适应当时战乱的形势。韩建改筑后的新城，是为五代、宋、元的长安城。

公元907年四月，朱温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唐亡。朱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五代时期。同五代频繁更迭的王朝相适应，长安的名称几多变易。后梁开元元年（907年），废西京称号，改京兆府为雍州大安府，因由佑国军节度，故又称佑国军城。三年（909年），佑国军改名永平军，故称永平军城。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复为唐制，称西京京兆府，两年后称西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废西京、西都称号，改由晋昌军节度，故称晋昌军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晋昌军改名永兴军，故随又易称永兴军城。五代时，军、政建置合一，节度使兼任府尹，“军城”亦可称“军府”。但不管怎样变易，人们习惯上还称当时的西安为“长安”、“京兆”或“京兆府”。



朱元璋修建 西安城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曾想迁都西安，同时考虑到西安在大西北和全国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对西安的建设特别精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决定封次子朱棣为秦王，同时开始做创立王府官制、经费、礼仪的准备工作，开始考虑西安城及秦王府的修建问题。次年建筑工程全面开始，由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等人负责监修。洪武六年(1373年)，耿炳文等

“以军力不足，西安之民耕获已毕”为由，“乞令助筑为便”。次年，朱元璋特派宋国公冯胜前来助筑。洪武十一年(1378年)，西安城和秦王府城基本竣工。《陕西省通志》称西安城“周40里，高3丈，门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四隅角楼四，敌楼98座”。经实测，明西安城周长11.9公里，南城3.4公里，北城3.3公里，东、西城各2.6公里，呈长方形，这比元代奉元城约大四分之一，奠定了今西安城垣的基础。秦王府城“周围3里309步5寸，东西150丈2寸5分，南北197丈2寸5分”。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这个秦王府城位于西安城内，又名秦藩府城、王城，讹传皇城，即今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的新城。

洪武十二年(1379年)，西安城中水皆咸卤，不可饮用。朱元璋命引龙首渠水入城中，萦绕民舍。朱棣在城内营建私人园林，引水种莲，称莲花池，是为今西安莲湖公园的前身。

洪武十三年(1380年)，西安鼓楼建成。十七年(1384年)，钟楼建成(原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重修了清真寺(位于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今大学习巷北段)。二十年(1387年),又修建了城隍庙(原在今九曜街)。此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城隍庙移于广济街口西侧。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陕西巡抚王荩主持修建了西安四城门楼。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陕西巡抚张祉给西安城墙外面砌了一层青砖。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陕西巡抚龚懋贤将钟楼移至西安中心位置,

使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四方笔直地辐射出去。明思宗崇祯末(1642年左右),陕西巡抚孙传庭修了四关城。这样,就基本上固定了今西安城的规模和外貌以及城中主要街道的布局。

综上所述,明代是西安发展史上的一个复兴时期,朱元璋是这个复兴时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谁为《资治通鉴》取名

《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巨著,总计300多万字,取材广博,组织严谨,如出一人之手。陈支平先生在《历史学的困惑》中说:“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在撰写编年体中国史学巨著时,把他的这部著作起名为‘资治通鉴’。”

其实,给《资治通鉴》

起名的不是司马光,而是宋神宗。该书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范祖禹等人花了19年时间编成的。书成后,进呈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上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故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

在人们的想象中，延安时期（1935~1947）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写稿有酬劳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

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征稿信说：“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

酬的。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

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

稿酬有钱有物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约值2~5角。

古代信访举报的沿革

在舜当部落联盟首领时,我国就有了负责深入民众、听取谏言的纳言官。夏商周时,民众多以诗歌反映社情民意,纳言官便化身为采诗官。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实行广泛的舆论监督和信访举报制度。齐威王对监督和举报者有丰厚的奖励:对当面批评过失的,给予上等奖赏;用竹简写信批评的,给予中等奖赏;在大街小巷批评朝政得失的,听到的给予下等奖赏。而齐威王听到批评后,及时改正过失、处理污吏,国家也很快政通人和。

汉朝统治者为了鼓励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行为,专门设立了“言变事”制度,规定普通民众可以要求官府提供食宿、车辆,直接进京到朝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行为,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个人见解或直接给予批评。汉武帝对民众举报的线索都派监察官调查。据记载,当时惩治贪官污吏的线索,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民众的举报,以至于后来统治者会把民谣作为罢黜官吏的依据。汉宣帝时,“言变事”制度有了创新,名臣赵广汉创立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举报箱设立以后,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地方上的不法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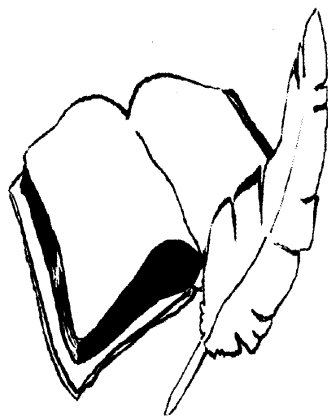
到了唐朝,君臣非常重视总结隋朝

二世而亡的教训。李渊、李世民十分鼓励官吏民众信访举报。武则天当朝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686年,她命“置匭(又称匭匣,是朝廷接受臣民投书的匣子)四区,共为一室,列于朝堂”,投书按内容不同分别掷于一匭中,“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

明朝时,朱元璋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力。他在《大诰》、《大诰续编》中要求,各地如有贪官污吏,城乡居民可将其绑缚赴京,“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不得阻挡”,“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清从明制,也鼓励民众对官吏实行监督。顺治专门下诏要求科道官“风闻言事”,揭发不法官吏,特别是高官的贪污行为,明确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实”,要求直言无隐,言必有据。康熙掌握朝政后,多次下令要广开言路,鼓励官吏民众特别是言官以风闻之事入告参劾。

可惜从雍正后,举报的内容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实”的并不多,这项制度成了官员们“互为告讦”的手段。到了清末,无论是官场还是民众无不“风闻言事”而色变,这是异化信访举报的结果。



曲笔的缘起

曲笔这种手法,应该是从写史开始的。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杼纵容别人杀死君主庄公,史官直接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一看不对劲,将他杀了;史官都是世袭的,哥哥死了,弟弟拿起笔来,也写“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其弟;另外一个弟弟来了,也这样写。崔杼大概被这阵势吓住了,终于没再动手。不过,后来的史家可没这么幸运。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夺取侄子的皇位后,让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其实就是让他来为自己在历史上做伪证。方孝孺落笔便写“燕贼篡位”,朱棣让他重新写,并威胁要杀他九族,方孝孺不服气,梗着脖子犟嘴:“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朱棣说,好,我就灭你十族。史家既然不为我所用,大

不了多杀几个人。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过后,史家为不触怒当权者,开始采用曲笔寻求平衡点。其方式,一是完全按当权者的意愿去写,昧着良心说瞎话;一是在保留事实的基础上表一下态。前一种不在少数,后一种则最为常用。恐惧威压下的曲笔,几乎就是踩着钢丝跳舞,一方面是良知,一方面是大棒和砍刀,要想跳得好看又不掉下来,谈何容易!

可是,凡能把直笔逼成曲笔的环境,根本也容纳不了曲笔。只要看出其中的门道,自然是见一个杀一个。这个过程中,难免疑神疑鬼,捕风捉影。历代文字狱莫不由疑神疑鬼开始,以血雨腥风结束。所谓曲笔,只是史家和思想家们的掩耳盗铃而已。

因此,鲁迅感叹说,中国“从来不缺真话,而是缺少一张西方式样的,摆放真语的圆桌”。



丝绸之路:打通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外传的通道

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古代,有一个地方让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希腊文明产生过全方位、长时间的交流,这个地方就是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所在。

汉朝时期,中国的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经由丝绸之路,不仅盛行于中亚和西亚,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

为了换取中国美丽的丝绸,罗马帝国的金币每年大量流向中国,以至于罗马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男子穿着绸衣。

与丝绸相伴,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开始西传。铸铁技术被逃亡的汉朝士兵带到中亚和西亚,土库曼斯坦的太鹿成了当时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就连罗马都要从这里进口中国的钢铁。

丝绸之路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通道,并在以后几千年里始终扮演着中外文明桥梁的重要角色;沿着这条通道,中国的茶叶、纸张、书籍走向海外,外国的商贾、文人、僧侣慕名而来。这种中外文化的有效互动成就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四次传播高潮

的巨大魅力。

唐朝:占据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二三百年来,全世界的文明制高点在长安——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

在当时,长安也是亚洲各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就有8000多学生来长安学习,并将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与技术带回本国。

盛唐时期,工商业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为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奠定了坚实基础;政府

开明而开放的对内对外政策,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环境;而唐朝广袤边界上呈现出的安定气象,则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有利保障。

唐朝的瓷器也深受世界欢迎,阿拉伯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灯并称为“三大名牌货”,埃及开罗曾出土唐朝陶器1万多片,著名的“唐三彩”在日本也有仿制品,被称作“奈良三彩”。

唐朝时期,中国的炼丹术极盛,不少波斯商人慕名前往长安购买丹药。伴随着丹药传播到中亚和西亚的是中国

●史料钩沉●

的化学知识,阿拉伯化学家贾比尔据中国炼丹术知识和本人实践,写下《秘典》一书,后经意大利学者翻译,炼丹术由此传到欧洲。

对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唐朝具有无法企及的“软实力”。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鉴和吸收了中国的文字、政治制度、建筑风格甚至生活习俗,使本国的文化得以发展。

元代:中国文化走向西方

如果说,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无与伦比的话,那么元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亚洲范围。蒙古人的西征以及四大汗国的建立,使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处在成吉思汗子孙的统治下。

1921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其游记轰动欧洲。书中对中国大量翔实、生动又充满想象色彩的描述,让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欧洲人眼界大开,对中国的繁荣昌盛极为倾倒。

1325年,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北京,他在这里居住了3年,他惊诧于大汗朝会的气派和狩猎的壮观,对北京皇宫——“全世界最美丽的宫殿”的描述让欧洲读者叹为观止。甚至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也以杜撰中国游记为荣。

明清:掀起一个世纪的热潮

明清之际,中国的海外影响力达到巅峰。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以利玛窦、艾

儒略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心存对中国文化的景仰来到中国。他们写下大量关于中国的回忆录、游记和书信,全方位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这一时期,四大发明远渡重洋,传播到欧洲。直到18世纪,欧洲造纸技术的提高还必须依赖中国。另外三项发明——火药、罗盘、印刷术,则成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欧洲人开始翻译中国的经典书籍。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往意大利;比利时人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法国的耶稣会士孙璋等人开始翻译《诗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二进制理论。

在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中国艺术以新奇、精致、纤巧和优雅,成为欧洲洛可可新艺术风格的灵感源泉。法国著名画家华托深得中国绘画精髓,其作品《孤岛帆阴》陈列于卢浮宫内,一派江南风光。

马若瑟翻译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欧洲各大舞台不断上演。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纷纷以中国开明的政治制度来映照他们的不足。伏尔泰把康熙皇帝比做他心目中的哲人王,并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中国文化犹如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冲击着欧洲社会,其影响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西安古城墙之城门

明清西安城四面各开一座城门,东门名长乐门,南门名永宁门,西门名安定门,北门名安远门。四门取名之意,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对政治军事重镇西安城,寄托了镇守西北,安定边域,屏固帝国的厚望。现四城门门楣上的门名是民国元年(1912年)7月陕西督军张凤翔题写的。

长乐门为西安城东城门。位于东城墙中部偏南,南至东南城角二百五十丈,合800米;北至东北城角六百三十三丈,合2025米。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1374~1378)拓筑西安东城墙时筑。此门约在原唐长安城东郭安兴坊与胜业坊两坊之间东西横街的西段,唐末韩建以

皇城改建为新城时隔在大城之外,约为咸宁县治小城之地,明初拓筑西安东大城时新筑为长乐门,门上建有正楼,门下开有用城砖券砌而成的圆拱式一门洞。门洞通长30米,以安门处为界分为内外两段。内段洞宽6米,高9米,在进深22米处安有城门两扇,门外洞宽5.1米,高5.2米。城门门扇极为坚厚,用厚大木板制成,每扇门宽2.9米,高5.8米,厚0.16米,门重3.19吨。加了加固门扇,在木门扇上,从上到下横箍着九道宽15厘米、厚23厘米的铁筋。在两道铁筋的间隔处,钉着184个四棱攒顶的铁蘑菇钉,平均每扇门板上共钉有1800个,从而增加了门扇的刚度,使敌

人箭矢难以射中木门,加强了城门对抗进攻的能力。东城门外筑有瓮城、月城与东关城,瓮城上建箭楼,月城上建闸楼(炮楼),层层包拱相卫,组成城门的严密防御工程体系。长乐门是明清西安城东面进出的唯一门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就是从此门攻进西安城的。明代时,长乐门内以东西向大街(今东大街)直通城中心钟楼。清代时,沿东门南侧至钟楼包筑入满城,东门仅成为满城的东面出口。民国初年拆除满城南墙,恢复西安东城门与东大街旧制。1986年于东城门洞南北两侧各开三座砖砌拱券门洞,共长55米,供行人车辆通行,原城门洞不再使用。

永宁门为西安城南城门。位于南城墙中部偏西,东至东南城角七百三十四丈五尺,合2350.4米,西至西南城角五百五十丈,合1760米。北与北城门安远门南北相直。原为隋唐长安皇城城南面偏东的安上门。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由于先封闭了南面中门朱雀门和南面偏西门含光门的西门洞与中门洞,仅留一个东门洞,北宋哲宗元祐之后又封闭了含光门东门拓筑西安城墙,此门沿用为南城门。但改原隋唐时过梁

式三门洞为砖砌拱券式单门洞,易名永宁门,取其永保安宁之意。其门下砖砌拱券形门洞,通长29米,以安门处为界分为内外两段,内段洞宽6.1米,高8.8米,于进深21.5米处安置门扇,原木门已毁。外段洞宽5.1米,高5米。门上建有高大的城门楼,门外有瓮城箭楼、月城闸楼层层拱卫。永宁门洞原为南面进出西安城的必经之道,解放后适应城市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1956年在南城门东西两侧,各开砖砌拱券城洞三孔,每孔跨度7米,以供行人车辆通过,原城门洞不再供交通使用。

安定门为西安城西城门。位于西城墙中部偏南,北至西北城角五百三十丈,合1696米;南至西南城角三百丈,合960米。原为隋唐长安皇城西面中门顺义门,明初沿用为西城门,但改原过梁式三门洞为砖砌拱券式单门洞,并易名为安定门,喻意西部边疆民族和睦,安泰康定。门洞通长33.9米,以安门处为界分为内外两段。内段洞宽6.3米,高9米,在进深26米处安有横箍铁筋、布满铁蘑菇钉的坚厚木门两扇。门外洞宽5.2米,高5.8米。原为西安城西面进出的必经通道,解放后为适应城市交通发展,于1987年在原城门南北两侧各

开三个拱券形门洞,六洞宽度为 55 米,出右入左,供行人车辆通行,原城门洞不再使用。

安远门为西安城北城门,位于北城墙中部偏西,此处原为唐长安城太极宫与东宫交界宫墙的中段,唐末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时被隔在北城墙之外,明洪武初向北拓筑西安城墙时始筑为北城门。门下开一拱券形门洞。通长 30.8 米,以安门处为界分为内外两段。内段宽 6.1 米,高 8.2 米,于进深 23.5 米处安置门扇。门外洞宽 5.2 米,高 5.6 米。西安四城门洞,在建筑上外段皆较矮窄,而内段较为高宽,便于门扇从内严密封闭,防止敌军越过门扇向内洞抛掷火球进行火攻。北城门洞原为西安城北面的唯一通道,现原城门洞不再使用,另于城门东西两侧各新开两砖砌券门洞,四门洞宽皆 10 米,以供行人车辆通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内外交通往来的需要,西安城墙从民国时期以来,又新增开了十四座城门,其中民国时期增开四座,建国以来又再增开十座。

民国时期增开的四座城门

是:

中山门,又称小东门。在今东新街东端。1926 年开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为中山门。南北各辟一城门洞,共宽 13 米。南侧门洞叫“东征”,北侧门洞叫“凯旋”。

勿幕门,又称小南门。在今城西南隅四府街南端。1939 年开辟,单券洞,宽 6.5 米。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牺牲的陕西革命先烈井勿幕而命名勿幕门。

玉祥门,又称小西门,在今莲湖路西端。1928 年开辟,豁口宽 140 米。为纪念冯玉祥将军于 1926 年率国民军击败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北洋军镇嵩军刘镇华,解西安之围,时陕西省主席宋哲元特命名为玉祥门。现玉祥门豁口已连通城墙,下开三门洞。

解放门,原名中正门,在今解放路北端。1934 年因陇海铁路通车西安而



修,1952年因扩建火车站广场而拆除城墙,豁口通道宽516米。2005年5月,火车站城墙实现连接,下开三个状似拱桥的城门,跨度合计200米。其中中间的城门跨度达84米,两侧城门跨度各58米。

建国后新增开的十座城门是:

朝阳门,1994年开,位于东城墙北段,在东五路东端,原辟城墙豁口宽140米,通长乐西路。此门因位于西安城东,城门朝着太阳,是每天第一个见到阳光的城门,故取名朝阳门。现豁口墙体连接,下开五门洞。

建国门,位于南城墙东段,在建国路南端。1986年开,三门洞,共宽28米。因门连建国路,故名。

和平门,位于南城墙东段建国门之西,在和平路南端。1953年开辟,四门洞,共宽40米,因门连和平路,故名。

文昌门,位于南城墙南门之东,在柏树林街的南端。1986年开,四门洞,共宽38米,直通文艺路。因此门内明清时建有奉祀文昌星与文昌帝君的文昌庙,故名文昌门。

朱雀门,位于南城墙南门之西,在原隋唐长安皇城朱雀门处,故名。1986年开,共四个砖砌拱券门洞,共宽38

米。

含光门,位于南城墙西段勿幕门之西,在甜水街南端。1986年修城墙时,在此发现唐皇城含光门遗址而开,原留单门洞,宽13米,现为保护唐含光门遗址而于原门洞两侧另开各两门洞,以便行人车辆通行。

尚武门,位于北城墙西段,西北三路北端。两门洞,因此门西临城西北隅原清陕西巡抚循例校阅所辖绿营兵之习武园(亦称西武园)而得名。

尚德门,位于北城墙北门之东,在尚德路北端。1986年修,三门洞,共宽28米。因门内通尚德路而得名。

尚俭门,位于北城墙东段,解放门之东。三门洞。因门内通尚俭路而得名。

尚勤门,位于北城墙东段尚俭门之东,三门洞。因门内通尚勤路而得名。

总之,西安城的城门,明清时四面各开一门,共四门。民国时另辟四门,建国后新辟十门,西安城现共有十八座城门。其中东城墙三门:长乐门、中山门、朝阳门;南城墙七门:永宁门、文昌门、和平门、建国门、朱雀门、勿幕门、含光门;西城墙两门:安定门、玉祥门;北城墙六门:安远门、尚武门、尚德门、解放门、尚俭门、尚勤门。



《玄奘取经图》

这幅《玄奘取经图》，现存于陕西省长安县东南兴教寺内慈恩塔院的殿堂里，它刻在一个石碑上。兴教寺中有玄奘的尸骨塔，这座塔为唐时所建，历经修葺，至今尚存。据这里的法师讲，这幅《玄奘取经图》原为宋代工匠据宋人所绘《玄奘西游像》刻的，后由于战乱，寺院与石碑同遭破坏。本世纪初重修兴教寺时，又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而成为现在所能见到的这幅石刻。

图上的玄奘，身穿和尚服，胸

前挂着念珠，脚着草鞋，腰前系着个小包袱，里面放着衣物。他左手拿着经书，右手拿着拂尘(又叫蝇甩儿)赶飞虫。他身后背的是竹子做的书箱，里边放着经书。书箱顶上是伞，伞前垂着线，吊了一个小油灯，一只小蛾子绕灯飞着，这是玄奘取经图中，夜晚边赶路边读经书的情景。

这种装扮的玄奘，看来主要是宋代僧人的形象，我们在宋代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上，所看到的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形象，和这幅图上的玄奘的样子是很相像的。



求真务实 存史资治

——初议如何当好区志主编

杨忠诚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指组组长李铁映在 1996 年 5 月 7 日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闭幕时强调：修志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审定稿制度。要坚持“一纳入、五到位”，即要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要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要坚持求真务实、存史资治的要求，编修一批高质量的名志。要修志为用，为改革开放服好务，要培养造就一批甘愿奉献、铁心修志的专门人才，以推动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永不断章。

修志要反映时代的伟大变革，要记述中华民族摆脱历史羁绊，实现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史，特别是当前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谱写新的篇章。

在当前这样的新形势下，区志办主任这样的领导者，一般情况下应担任区志主编。如何当好区志主编？结合边学

习边总纂本级志书的实践和学习、理解、消化志书编纂知识，仅就区志主编应具备的素质谈谈初浅认识。

区志的编纂业务要求主编应具备德、学、识、才、行五个方面的良好素质。德。作为区志的主编，应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永远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发扬新时期的伟大创业精神。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以编出社会主义新时代名志为己任的献身精神，“板凳宁坐十年冷，志书不写一句空”。要有敢于秉公处事不徇私情的史家风范，有克服一切困难编好志书的坚强意志。只有具备这样的品德，才能在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关系中，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而“以绝请托”，做到“是非不谬”，以精品志书资政于当代、惠及于子孙。

学。作为区志主编，应是博学多闻，明古知今，具有获取群科知识的能力。这是修志必备的基本功，非此不能面对百科纷陈的各门类资料而不为所困，从

本质上“以决取舍”。方志本身就是一门横向结构的学科,它面向百科,又引进百科为己所用。毛泽东同志早年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很好地向群众学习,也是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总纂区志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集全区民众之智慧,采本区天地之精华。

识。作为区志主编,应当熟悉中国的方志史、方志理论知识。只有了解方志的起源发展、性质功能、体例特点、分类原则,才能在编写志书中正确处理各种实际业务问题,并进而“推陈出新”,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志学科作出贡献。主编应具备的“识”的要义,在于继承方志的优良传统,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志观,使主持编写的志书在内容上、形式上能反映出今天的实际,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才。作为区志主编,应该具有记述史实的综合能力,包括文字表达才能。志才不是生而有之的,是靠长期的刻苦学习、勤奋积累、钻研业务和具体的修志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个修志人员、一个主编,志才是其在修志实践过程中锻炼形成的各方面素质的综合反映,其决定的因素,则是在千头万绪的修志业务中,能始终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问题,既有原则性又有

灵活性地把握志书编纂的基本功。

行。作为区志主编,应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在整个修志过程中,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开拓创新,既谦虚谨慎又雷厉风行,既依靠群众又当机立断,既细致周到又大胆负责,既埋头苦干又灵活开放的工作作风。对重大业务问题,决断前要充分发扬民主、多方征询,决断后要严格执行,令行禁止,把修志班子组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分头各负其责,合则协力攻关。例如,实行志书编写人员“三级责任”过程中,在主编主持下的编辑职责,副主编职责履行要到位。编辑按时对分担的篇章进行认真编写,交副主编审查合格后方能脱手。同时必须协助副主编对分口的单位进行联络,补充资料,直至完成编纂任务。

综上所述,区志主编应具备的五个方面素质,存在着内在联系,不可偏废。要做到德足以利存真求实,学足以利科学合理,识足以利记述得当,才足以利开拓创新,行足以利众手成志。这就要求身负重任的区志主编认真修养,行成于思,业精于勤,在主编工作的实践中按照德、学、识、才、行五个方面认真锻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区志主编。

过 年 的 习 俗

编者按:说起过年的习俗,大家都了然于心,除夕家人团圆吃饺子,十五元宵佳节猜谜逛灯会。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过年的习俗,或因日久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本期稿件择其部分进行介绍。

【正月初二】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祭祀的供品主要用鱼和羊肉。老北京的大商号,这天均大举祭祀活动,祭品要用“五大供”,即整猪、整羊、整鸡、整鸭、红色活鲤鱼等,祈望今年要发大财。

【正月初三】 烧门神纸,旧时初

三日夜把年节时的松柏枝及节期所挂门神门笺等一并焚化,以示年已过完,又要开始营生。俗谚有“烧了门神纸,个人寻生理”。

小年朝,即天庆节。宋代宫廷节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真宗下诏书,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后来称小年朝,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五日,北方叫“煮饽饽”。有的人家只吃三、二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是,就连待客也如此。妇女们也不再忌门,开



始互相走访拜年、道贺。新嫁女子在这一天归宁。一说破五这一天不宜做事，否则本年内遇事破败。破五习俗除了以上禁忌外，主要是送穷，迎财神，开市贸易。

南方人在正月初五祭财神。民间传说，财神即五路神。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

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谓五路，当是东西南北中耳。”

俗以为接路头，越早越好，最早接到的才是真神，特别灵验，因此叫“抢路头”。有的地方，真的在元日初四便“匆匆抢路头”了，且相沿成俗。

至于人们在元月初五祭拜路头神，并以此日为其生日，乃五路神中之“五”与初五之“五”牵连之故。北方于此日祭“五穷”也是一样。在正月而非其他月，乃取新年新气象，图一年吉利，财源茂盛，东西南北中，财富五路并进。

正月初五“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这一天各家用纸造妇人，称为“扫晴娘”，“五穷妇”，“五穷娘”，身背纸袋，将屋内秽土扫到

袋内，送门外燃放炸之。这一习俗又称为“送穷土”，“送穷媳妇出门”。陕西韩城一带，破五这一天忌出门，而且要将鲜肉放在锅中炙烤，还要爆炒麻豆，令其崩裂发声，认为这样可以崩除穷气，求得财运。此外旧时除夕或正月初五要吃得特别饱，俗称“填穷坑”。民间广泛流行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正月初七】 人日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传说女娲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开始重视。古代人日有戴“人胜”的习俗，人胜是一种头饰，又叫彩胜、华胜，从晋朝开始有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来贴屏风，也戴在头发上。此外还有登高赋诗的习俗。唐代之后，更重视这个节日。每至人日，皇帝赐群臣彩缕人胜，又登高大宴群臣。如果正月初七天气晴朗，则主一年人口平安，出入顺利。

民间此日要吃春饼卷“盒子菜”（熟肉食品），并在庭院摊煎饼，“熏天”。

七宝羹，用七种菜做成的羹，在人

●文史拾趣●

日的时候食用,以此来取吉兆,并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医治百病。各地物产不同,所用果菜不同,取意也有差别。广东潮汕用芥菜、芥兰、韭菜、春菜、芹菜、蒜、厚瓣菜;客家人用芹菜、蒜、葱、芫茜、韭菜加鱼、肉等;台湾、福建用菠菜、芹菜、葱蒜、韭菜、芥菜、荠菜、白菜等。其中芹菜和葱兆聪明,蒜兆精于算计,芥菜令人长寿,如此种种。

【正月初八】 谷日,传说初八是谷子的生日。这天天气晴朗,则主这一天稻谷丰收,天阴则年歉。

顺星又名祭星。正月初八晚上,人们无论是否去庙里进香祀星君(即顺星),等天上星斗出齐后,各家都要举行一个顺星的祭祀仪式。祭星时,要在案头、灶台、门槛、锅台等处各放一盏“金灯”(黄灯花)并点燃,叫“散灯花儿”,有避除不祥之意。祭星结束后,全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元宵。

【正月初十】 石头生日,这一天凡磨、碾等石制工具都不能动,甚至设祭享祀石头,恐伤庄稼。也称“石不动”、“十不动”。河南风俗这一日家家向石头焚香致敬。午餐必食馍饼,认为吃饼一年之内便会财运亨通。在山东郛城等地有抬石头神之举。初九夜,人们将一瓦

罐冻结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初十日早晨,以绳系罐鼻,由十个小伙子轮流抬着瓦罐走。石头不落地则预示当年丰收。

旧时民间俗信,在正月举行的祀鼠活动,亦称“老鼠嫁女”,“老鼠娶亲”,具体日期因地而异,有的在正月初七,有的在正月二十五,不少地区是正月初十。山西平遥县初十日将面饼置墙根,名曰“贺老鼠嫁女”。湖南宁远则以十七日为“老鼠嫁女”,这一日忌开启箱柜,怕惊动老鼠。前一天晚上,儿童将糖果、花生等放置阴暗处,并将锅盖簸箕等大物大敲大打,为老鼠崔妆,第二天早晨,将鼠穴闭塞,认为从此以后鼠可以永远绝迹。还有的地区于老鼠娶妇日很早就上床睡觉,也谓不惊扰老鼠,俗谓你扰它一天,它扰你一年。





古代干部履历表

古代的官吏选拔考察及任免升迁等干部人事管理,统称“选举”,划进范围的对象都叫“选人”,意即有人仕资格而候选于吏部的人。凡选人报请“选举”,或参加相应的考试,都要填写一份类似今日之“干部履历表”的文书,作为个人档案。履历的叫法,因时而异,有“行状”、“家状”、“簿伐”、“出身”等种种名目,宋、元、明称“脚色”。

履历“衡度”才能 《后汉书·吕强传》云:“旧典选举……咨其行状,度其行能。”行状即当时的履历称谓,说明远从汉代起,国家选任干部的第一依据,就是从他的履历记载来衡度他的品性才能。

北宋时,副宰相吕惠卿的弟弟吕谅

卿本无选人身份,却想出任监官。吕惠卿“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即出敕以授”。说白点就是利用权势,强迫组织部门给他弟弟办理转干手续,填写正规的干部履历表。范仲淹曾给宰相兼枢密使韩琦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到某故人的儿子已“得殿侍左班”(后备干部),但一直没能实授,

所以央请韩琦“如有指使、安排处,乞留意”,并道“曾申脚色状来,今上呈”。由此可见,即使是求人帮忙跑官,一份能代表干部资格的“脚色”必不可少。

“脚色”和仕途的关系如此密切,其项目的细密便成题中应有之义;又因为每一项都必须本人亲笔填写,有时竟会显得荒唐可笑。

《梦溪笔谈》卷二五记有一则趣闻:福建一带有个黑社会头子廖恩,拥有徒党千余,罪行累累。不少官员都因镇剿无功,被罢免职务。可他又走通了“招安”的路子,补授右班殿直,成为国家“后备干部”。及前往组织部填报脚色时,正巧那些当初因受他牵连而撤职的官员也在那儿送脚色,照例都要在“有

无过犯”这一项中,写明各自所犯过失所受处分。“独廖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就是自从取得国家后备干部身份以来,没有任何公私方面的过失和违法。推敲起来倒并非谰语,光凭脚色内容来衡量,竟是一个清白的“选人”了。

伪造家世、虚报年龄 官场上履历作伪的现象屡见不鲜,从伪造家世到虚报年龄,无奇不有。

最为常见的是年龄作伪。许多人便在报考时“减年”,为日后争取优待留下余地。相反,那些通过“荫补”便可直接进入仕的公卿宦宦的子弟,又以增报年龄为及早显达的惯伎。如宋时洪迈的儿子,才满周岁便成了登记在册的后备干部。真相的暴露,往往又发生在与年龄要求有关的关节点上,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再乞引年致仕奏状》云:“官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原来彼时政策,年满七十才可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相应待遇,只想准点致仕的老先生不得已,只好把当初在履历上的造假主动交代出来。

都说中国人笃敬祖宗,又谓“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倘从履历造假的史实看,也不尽然。自汉末魏晋至南

朝的授官,“按阀阅而选举”,就是看选人履历上的家庭出身,是否门阀世族,是否累世做官。于是伪造谱牒家世便成了时代风尚。只要有助于争名跑官,乱认祖宗是不碍事的。

古代履历公证制度 针对履历造假的积弊,历代各朝都设想不少对策。唐太宗曾就选人“诈伪阶资”的现象屡禁不绝,发布过一经揭发即予处死的敕令。为此还与承办这种案件的大理少卿戴胄展开过一场法治还是人治的辩论,事见《贞观政要》卷五,最终是“诈伪者”被判处流放。

为求从制度上杜绝履历造假的弊害,宋代又有公证处的发明。其大体方式是:自各路州县到京城,都设有一个称为“书铺”的公证机关,凡诸路选人进京应试,或待差注阙,一应文书、凭照、脚色和荐状等,都要经当地书铺验证加印,由选人自己带到京城后,再去这个中央级的书铺送交审查。所有这些证明文件再经验证后,才由本人分别送往各自所属的铨选机关或主管举试部门,称“投状”,也就是投送个人档案。有关部门就以这份档案作为选拔任命或差遣注拟的主要依据。

王羲之妙书春联

晋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年从山东老家移居到浙江绍兴，此时正值年终岁尾，于是王羲之书写了一副春联，让家人贴在大门两侧。

对联是：

“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

可不料因为王羲之书法盖世，为时人所景仰，此联刚一贴出，即被人趁夜揭走。家人告诉王羲之后，王羲之也不生气，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再贴出去。这副写的是：

“莺啼北星，燕语南郊。”

谁知天明一看，又被人揭走了。可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眼看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了春联，惟独自己家门前空空落落，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个办法。

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笑，又提笔写了一副，写完后，让家人先将对联剪去一截，把上半截先张贴于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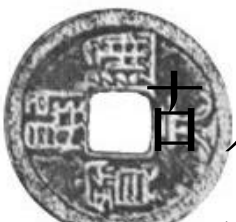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夜间果然又有人来偷揭。可在月色下一看，见这副对联写得太不吉利。尽管王羲之是书法名家，可也不能将这付充满凶险预言的对联取走张挂啊。来偷揭的人只好叹口气，又趁夜色溜走了。

初一早晨天刚亮，王羲之即亲自出门将昨天剪下的下半截分别贴好，此时已有不少人围观，大家一看，对联变成：

“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众人看了，齐声喝彩，拍掌称妙。



古人话金钱

唐人张说把金钱比喻成一味中草药，以《钱本草》成文，别具巧思：“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贫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此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礼，则弱智伤神，切须忌之。”钱的药性如此之大，如果服用不当胡乱下肚，恐怕不止是“令人霍乱”，可能连老命也得搭上。

古人将钱称为刀，繁体的钱字右边有两个“戈”。明人郑瑄在《昨非庵日纂》

中，记载了两段名言：“尝玩‘钱’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杀人之物而人不悟也！”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另辟蹊径，以诗文形式给金钱画了像，名曰《金钱图》：“钱钱，命相连，黄童白叟口

流涎。读什么书，参什么禅，屈膝低头望周全。得了十数又想百，一百到手复求千。聾瞽痴哑日奔波，士农工商夜无眠。舔铜臭，啼铜边，多般丑态世称贤。山僧百炼舍利子，钱中说法互牵缠。有钱四海皆兄弟，无钱骨肉亦徒然。英雄钱尽归故里，妻子下衽欲绝弦。庸富施施骄妻妾，步步相随夸宿缘。无钱徒嗟经满腹，有钱能制生杀权。相争相夺无他事，为钱钻弄颠倒颠。我曰多钱终多累，画破钱世别有天。”寥寥数语，将金钱的魔力刻画到了极致。





胡适章士钊斗文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他还是抽空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这自然触及白话文领袖胡适。章士钊撰写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发表在《新闻报》上,直指胡适。

胡适对此是“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一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而了之。从此两人互不相见。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士钊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给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你不攻来我不驳”,一个“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





古代的 “衣帽取人”

中国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服饰装束,因而有“只认衣冠不认人”、“衣帽取人”之说。

布衣: 是庶民百姓的代称,意为只穿得起粗布衣服的人。

绅: 绅为古代士大夫系在腰间的大带子,绅士指的便是那些有地位、有功名的人。

纨绔: 纨为白细的绢绸,绔即裤。能穿白细高档绢绸裤子的人,多为富家子弟。

麻衣: 也称“白衣”。穿着麻衣者,为赴试求官的考生。

青衣: 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为富家的奴婢。

黄冠: 古代道士用黄冠束发,

因此后来又把道士称为黄冠。

黄裳: 黄色最为尊贵,而黄色之裳意味着臣居尊位,黄裳也就成了太子的别称。

绿裳: 穿绿裳或戴绿巾者,指农民。

左衽: 衽为衣襟。中原汉人衣襟向右掩,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则向左掩。因此左衽泛指受异族统治的人。

甲: 甲为古代战士的护身之战斗服装,多用皮革和金属片制成。故后来以甲代称士兵,也称为“兵甲”。

珠履: 穿缀有明珠的鞋子者,指豪门宾客。

唐朝“孝”法

“百善孝为先”，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在唐朝，孝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

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鰥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唐朝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古之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了这么一件事：一次有一个人拿了鱼去送给当时鲁国的宰相公休仪，公休仪不接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我送你鱼，你为什么还不要呢？”公休仪回答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呢。我现在还是宰相，能够自己掏钱买了吃上鱼；如果今天我接受了你贿赂的鱼而触犯禁忌遭到罢免，以后不但自己没钱买鱼，更没有谁会给我送鱼。”

“循吏”的特点在于一个“循”字上，其执政特色是“无所变更”。太史公给循吏下的定义是“奉职循理”，实际上，“循理”是次要的，因为别人已经把“理”定好了，无须你再动脑子，关键是要“奉职”，即照章办事。《循吏列传》中人物大都如此。一般来说，循吏能“无所变更”，不挠民，民得以休养生息，总比在贪官治下要好得多，所以“亦可以为治”。公休仪拒鱼，看起来是清官在拒绝贿赂。但其可爱处在于，既承认自己“嗜鱼”，又以能长期“嗜”鱼为立足点，不贪眼前小利，所以老老实实说“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不像现在有些官员动辄“为民父母”、“天下为公”、“本大人一贯为官清廉”——高调比谁都唱得响，满嘴的仁义道德，却是一肚子的钱权美色！

宋代女子的洒脱日子

都说唐朝女子的生活时尚且地位高，是历朝历代女子的生活黄金期。其实，宋代女子的生活一点不亚于唐代女子。宋代女子大胆开放，经济活动活跃，家庭地位高。

说宋代女子大胆开放，从宋词中就可窥得一二。就拿最有名的才女李清照来说，豆蔻年华，便写词道，“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真是哪个少女不怀春，小小年纪已知偷窥帅哥了。成年之后，“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不仅晚归，还喝酒喝得不醉不归，小日子过得可比现代女子洒脱和滋润多了，现代有几个女子有闲情赏落日，划舟野渡，不醉不归的。

如果觉得这还不够潇洒，再来看看她们约会，其大胆程度估计唐朝女子得自叹不如。朱淑真的《清平乐》为证：“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于含烟带露的季节来到湖上，不仅与心上人“携手湖上路”，还“和衣睡倒人怀”，不顾羞怯地倒向恋人的怀抱。一个女子敢于写出这样的词句，又有哪几个朝代的女子敢这般大胆和放肆？



历史上的七次 金融危机

1637 年郁金香狂热 在 17 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1637 年的早些时候，当郁金香依旧在地里生长的時候，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甚至几千倍。一颗郁金香可能是 20 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泡沫。而该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在一个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交换体系下，政府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角色？

1720 年南海泡沫 1720 年倒闭的南海公司给整个伦敦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7 世纪英国经济兴起，而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为

此南海公司觅得赚取暴利的商机，即与政府交易以换取经营特权，私下发行股票，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价格狂飙到 1000 英镑以上。公司真实业绩与人们预期严重背离。后来因英国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1837 年经济恐慌 1837 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支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 1843 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如下几点：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转移，分散了储蓄，妨碍了集中管理；英国银

●文史拾趣●

行方面的压力;储蓄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1907年银行危机 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1929年经济大崩溃 1929年10月24日,惊慌失措笼罩了华尔街。由于投机者们蜂拥着争取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卖出手中的股票,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已跟不上股市迅速下跌的行情。仅这一天就发生了1200万笔交易。到10月29日甚至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随着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缩减超过2/3,在大崩溃的头一个月便有260亿美元在股市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但这仅仅是大萧条的第一轮可怕打击。

过去,美国也曾经历过股市恐慌与金融萧条,但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对美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紧接而来的大萧条使大部分人身陷困境。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造就了华尔街的大崩溃。这就是“黑色星期一”。标普指数下跌了20%,一夜间,无数投资者被深深套牢,并陷入了痛苦境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危机接近尾声。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从而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打油诗

欣赏

【徐九经的为官打油诗】 明朝有个县令叫徐九经,他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足以表达他愿意为民效力的态度。那么,如何为民效力呢?他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头戴乌纱帽儿,当官不省劲儿,平事儿我不管,专管不平事儿。”这就是说,他专门过问损害百姓利益的不公平的事,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徐九经的打油诗微言大义,不啻是他为官清廉的政治宣言。

【为贪官送别趣诗】 相传有个贪官,他在某地为官数年,搜尽民脂民膏,离任时见没有什么钱财可捞,便在一把折扇上把当地的山水全画了进去。于是当地老百姓便编了一首打油诗为他送行:“来时萧瑟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只因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图画中。”此诗嘲讽贪官的百般贪婪,先以写意勾勒,再用工笔细描,语言别致,妙趣

横生,极富鞭挞力度。

【张英的界墙诗】 张英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安徽桐城人,其老家宅旁有一块空地,与吴姓为邻。一次,吴家修房越界,张家与吴家为界墙争执不休。张家遂驰书赴京,要张英出面干涉。可是,张英并未干预,只是寄回一首打油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见诗明理,撤让三尺,吴家深受感动,亦让三尺,互让之地后人称为六尺巷。

【洪秀全“打油”劝戒毒】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自幼目睹帝国主义的鸦片之害,遂在25岁那年写下一首劝告人们戒毒的打油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此诗极言鸦片的危害和戒毒的迫切性,指出任何人只要沾上那小小的烟枪,哪怕是铁骨铮铮的英雄汉,也要被烟枪的子弹打死在高床上,语言明白如话,比喻生动形象,读来幽默风趣,发人深省。

【意味深长的《颠倒歌》】 我国诗歌园地里有一种颇为有趣的反义诗,这类诗多为民谣打油诗,虽名不见经传,却广为流传。解放前北平流传的《颠倒歌》就属这类作品。歌云:“东西街,南北

走,忽闻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骑了轿子抬了马,吹了锣鼓打喇叭。”这首反语诗把事物都说反了,与学理相悖,但正是这种可笑的组合,含而不露地讽刺了当时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

【鲁迅先生的打油诗】 1927年之后,蒋介石建立起蒋家王朝,搜罗了各类人物。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鲁迅先生为此写打油诗嘲讽:“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对这些大人物的嘴脸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与讽刺,他们谒陵是假,排挤他人是真,尤其是第二、三两句可谓神来之笔,读来令人深思。

【丁玲的贺寿打油诗】 1937年2月1日,是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六十寿辰,延安根据地徐老祝寿。许多同志称赞徐老的革命业绩,作家丁玲即席赋打油诗一首,活跃了现场气氛。诗云:“长征二万五,衣服自己补。马儿跟着跑,生活最艰苦。闲暇爱读书,年老心不古。遵纪是模范,谦逊与人处。革命主义真,名利当粪土。大家贺徐老,共撰英雄谱。”

【陈毅《咏原子弹》打油诗】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激动万分,兴奋不已。欢庆之余,他吟了一首《咏原子弹》的打油诗:“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这首诗寓庄于谐,风趣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表明我们不怕核讹诈、核威胁,但我们更希望和平,愿意谈判协商,化干戈为玉帛。

【启功先生的打油诗】 启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经历坎坷,性情旷达,幽默潇洒,从他66岁所吟《墓志铭》即可看出。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起臭。”

【大家都吟《笑之歌》】 常言道,寿与笑相伴,大凡长寿之人,几乎都是乐观豁达喜笑者。有《笑之歌》打油诗为证:“笑一笑,心开窍,桑榆景色更美妙。笑一笑,年转少,心情舒畅迟衰老。笑一笑,疾病少,精神乐观赛仙草。笑一笑,老来俏,夫妻白头伴到老。笑一笑,儿孙绕,天伦之乐多热闹。笑一笑,四邻好,和和睦睦相关照。笑一笑,喜鹊报,人生第二春天到。嘻嘻笑,哈哈笑,快活还比神仙好。”

清代学者汪中说：“一奇二偶，一二可为数。二加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对十，则复归为一，十不可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古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又以奇数象征天，以偶数象征地。“九”是阳数中的极数，再大的数其尾数也大不过“九”。这样，“九”被视为天的象征；天分九层（九天），诞生日为正月初九；“九”也被附会于帝王，帝王称为“九五之尊”；同时，“九”也象征极高（九

“九”的讲究

霄云外）、极广（九州方圆）、极深（九泉之下）、极冷（数九寒天）……“九”之所以被皇帝崇尚，除上述原因外，“九”谐音“久”，也被当作吉利的数字。紫禁城之所以有九百九十九间房子，就是因为三个“九”谐音“久”，象征皇权永久、江山万代之故。

“熊猫”

名字的由来

大熊猫属于熊科，而不是猫科。它是中国的特产，但分布区狭窄，栖息在人迹罕见的高山密林，仅产于四川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西藏东部及陕西西南部。它身体肥胖，四肢粗壮，头大颈粗，眼小尾短。眼周、耳、前后肢和肩部是黑色，其他部分为白色。性孤独，喜食箭竹等竹类植物。春交配，秋产仔，每产1-2仔。

1896年，一位来华传教的法国神父在四川省宝兴县获得熊猫的毛皮，

喜出望外，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被鉴定为新物种，介绍于世。

当时用通行的拉丁文为其定了学名，意思是似猫足兽的熊，中文就译名为“猫熊”。据专家考证，熊猫的古籍名称有20多个，如白豹、白狐、食铁猫等等。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北碚首次展出熊猫标本时，说明牌上写拉丁文学名，为了和外文书写方式保持一致，就从左到右注上“猫熊”。当时中文均是直书，从右至左认读，于是观众就误读为熊猫，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唐代的尊称

尊称，即对被称呼者的尊崇的称号。一般用于对长辈或不熟悉者的称呼，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唐人的尊称丰富多彩。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载：“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言称足下。”“陛下”，是对皇帝的专称。陛，指帝王宫殿的台阶。“陛下”的本义是告知陛下执事之人，请其转告。蔡邕在《独断》中说：“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殿下”，原指诸侯王，因诸侯王在宫殿接见群臣而有此称，犹如称皇帝为陛下一般。在唐代，“殿下”亦指皇太子和皇太后，据《事物纪原》卷二称：“汉以来，皇太子、诸王称殿下，汉之前未闻。唐初，百官于皇太后亦呼之，百官洎东宫官，对皇太子亦呼之。”“麾

下”，是对将帅的尊称。麾，本为古代指挥军队的旗帜。称主将为麾下，也有自居部下之意。“阁下”，是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尊称。阁，又作闾，本是古代高官重臣办公的地方。称阁下颇类称陛下、殿下之意。不过在唐代，“阁下”的使用较为广泛，不单指有地位的人，同辈之间也可称。“足下”是古人书面语言中常用的尊称。据刘敬叔《异苑》卷一〇说，春秋时介之推追随晋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返国执政后，介之推不愿做官，“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夫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此说是否可信，尚难断言。不过在先秦时，上对下、下对上或平辈相称，都可用“足下”作为敬称。自汉以后，一般用于平辈和地位相当的人之间。“节下”和“轂下”，专称使节。此类称谓甚多，不一一枚举。

另外,还有许多尊称,如君、卿、父、公、子、大人、先生等等。“君”,是唐人应用极广的一种尊称。天子可以称君,下对上、上对下、平辈之间均可称,妻对夫也称君。如唐太宗对褚亮曰:“畴日师旅,卿未尝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新唐书·褚亮传》)“卿”,在唐代除了用为官爵外,也作为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爱称。朋友、夫妻间也可以“卿”为爱称。如《酉阳杂俎》卷一三载:“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梁,卿忘我耶?’”“父”,为最早的尊称,其本义为父系氏族社会中司火的长者,以后遂成为男子的尊称。汉代经师王肃说:“父,丈夫之显称也。”如今今天“父老兄弟”中的“父”,就是对年长者的尊称。古代帝王对大臣中某些功高位重者,也尊称为“父”。如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吕不韦、东晋的王导、唐代的郭子仪、李辅国等,都曾被称为“尚父”、“仲父”、“亚父”。大约在周代,“父”也成为父亲的称呼。“公”,多为对尊长或平辈的散称,

如李欣《赠张旭》诗:“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也作为上对下的敬称,如唐太宗赞扬裴矩曰:“公定多智。”(《新唐书·裴矩传》)“子”,也是一种尊称或美称,如人所共知的孔子、孟子、韩非子等。有时也称女性为子,如《北梦琐言》载:“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古代夫妻间称“内子”、“外子”等。“先生”,是对师长、老人和有德行者的尊称。贾谊《新书·先醒》曰:先生,“为先醒也。……学问不倦,好道不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

除了专用的尊称外,还有一些在称呼前加“尊”、“贤”、“令”、“大”等词,以表示尊敬的。《颜氏家训·风操》记载:“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则加贤字。”如尊君、尊公、家尊、令堂,贤兄、贤弟、贤侄等等。而在称呼前加“先”字,则表示对已故者的尊称。如先君、先大人,指去世的父亲,先妣,为去世的母亲,等等。

中共十大为何提前召开

林彪“9·13”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因为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还写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 11 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 13 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 1980 年左右才考虑召开。但是，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 4 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

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

确立新的接班人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了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在 21 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 1/3，即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注：当年 8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 1973 年 5 月 20 日至 3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喜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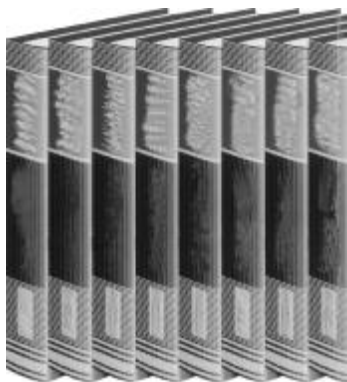
“红双喜” 的得名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然而却少有人知道我国生产的有关乒乓球运动的器具叫“红双喜”牌的来历。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联邦德国的特蒙德市举行。我国选手容国团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打败了日本、匈牙利的著名选手野战弥、西多等人，为我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竞技体育比赛的冠军。国际乒协执委们鉴于中

国取得如此好的比赛成绩，决定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为了迎接和办好这届世乒赛，国家体委决定由工业基础实力雄厚的上海专门生产这届比赛的专用球具。

在召开的迎接这届锦标赛的准备会议上，当人们议起这届锦标赛专用球具叫什么牌子时，才思敏捷的周恩来总理脱口而出就说：“容国团夺得了我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为国人争了光，这是一件大喜事；另外今年是我们国家建国十周年大庆，刚好是双喜临门。我看就叫‘红双喜’牌吧。”这就是“红双喜”牌乒乓球系列产品名称的来历，一直沿用至今。



书的别称

百城：《北史·李孝伯传》：“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称藏书富者为拥“百城”。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书田”。典故出自《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勤种播。”

经笥：经，经书，泛指最重要的有指导性的著作；笥，装书的箱子。《后汉书·文苑传·边韶》：“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又《徐陵·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学则经笥，文为世珍。”后人用“经笥”代好书多，用“腹笥”喻博学。

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

灾梨枣：梨、枣，木名，质地坚实，旧时用来刻版印书。为了刊行没有价值的文字，而使梨枣受灾。喻不好的文章、坏的书。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宋真宗《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

五车：语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喻书多。

汗牛充栋：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后人用“汗牛”、“充栋”或“汗牛充栋”来借代极为丰富的藏书。

丹铅：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亦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八大碗” 的由来

相传八仙过海惹怒龙王，久战难胜、劳累疲惫，遂退到海滩稍憩，颇觉腹中空空，饥饿难忍，便分头寻食充饥，哪知一眼望去尽是海滩薄地，荒无人烟。八仙除曹国舅外个个扫兴而归。

曹国舅一人不辞劳苦，腾云驾雾，行至内地，一股奇香扑鼻，不觉垂涎三尺，立即寻香进入凡间一庄上，乔装农家村夫在庄主宅院窥视，只见四方桌八人围坐、猜拳行令、畅怀痛饮、诱人的菜肴一个接一个地上。国舅寻思道：我原乃朝廷国舅，宫廷菜肴我享用得发腻，农家菜肴我未曾见过，何不先让我大饱口福，忽想众仙友腹空我不可独享，继而采带了七样菜肴，又想起仙姑不食荤，所以又为其独带了一盘素菜——青菜豆腐，计八大碗并留言：国舅为众仙借菜八碗，日后定当图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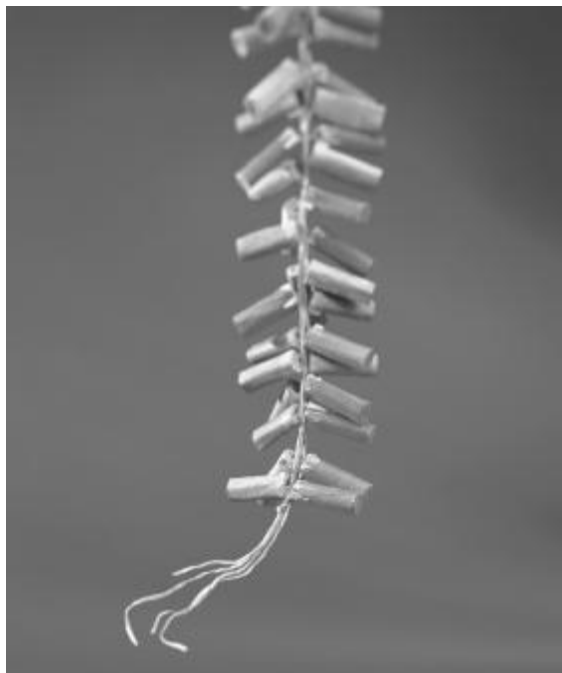
八仙狼吞虎咽更觉奇香无比，酒足饭饱之后精神倍增，再战龙王大获全胜。

以后人们为讨吉庆改方桌为八仙桌，坐八客、食八菜（八冷碟、八大碗菜）一直流传到今。

『不孝有三』是哪三条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孟子·离娄上》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并没有解释此“三”究竟是哪些，后来汉朝的经学家赵岐在《十三经注疏》中为

“无后为大”注释：“于礼有不孝者三，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也就是说，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简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集》。

诗歌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第三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

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作者本诗就是通过对新年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全诗文笔轻快，色调明朗，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融情入景，寓意深刻。